

竹湖風雲錄

楊德昌學長返校演講

二十一知識世紀來臨時人文與科技的平衡與互動

邱秋雲

獲得第五十三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交大傑出校友楊德昌學長，剛從坎城光榮賦歸後，隔天（5/31）就到交大進行了一場演講，講題為「第二十一知識世紀來臨時人文與科技的平衡與互動」，他表示是爲了回饋母校、也爲了答謝張校長的熱情邀約而來，他更希望能藉這個機會與學弟、學妹們分享他這幾年的經驗與感想。

一個陽光灑地的早上，楊德昌學長背著雙肩包包，一身体閒的裝扮出現在浩然國際會議廳的會場，吸引了不少的交大學弟妹們前來一睹他的風采。除了介紹他的電影新作「一一」，他還與大家分享了他轉行的經歷，以及他在科技和人文間獲得的不同啓發和思考。

爲什麼從高科技跑去拍電影？且聽學長細說從頭！

小時候愛塗鴉、畫畫

楊德昌學長說他從科技到人文，並非完全沒有背景，一跳就跳過去了，其實整個轉換的過程蠻長的。他回憶說，從他有記憶開始，就喜歡拿著一支筆，跟著哥哥亂畫、塗鴉，結果家裡構得到的牆都被畫滿了東西。

中學時，學長開始喜歡上電影，但在當時看電影是一種高消費，因此，同學間會彼此描述自己看過的電影情節給大家聽。楊德昌學長則將故事情節畫出來給同學看，這也開始他學習畫腳本的功夫。楊學長笑著說，他也會畫沒看過的電影，然後騙同學說他看過，自己編故事劇情，所以也有了編劇的經驗。當時他的名聲還不錯，同學都拿紙請他畫漫畫，因此他繼續編故事、畫漫畫，一旦遇到瓶頸，劇情發展不下去時，他就對同學說下一個故事更精采，然後把武俠劇變成一部西部拓荒記。他指出，正是當初的編劇經驗，讓他在後來的編劇結構上比別人少出錯。

考大學是一段特殊經驗

楊學長說進入交大是一個機緣。高中時，他成績並不好、只愛畫畫，一心想念建築系，於是選填了東海、成大的建築系，結果老師約談他，認爲他低估了自己的實力，更希望他爲建中的升學率盡點責任，所以他在建築系前多填了四個志願，交大控制工程系正是第四個，而他因多考了四分，就這樣成了交大人。

竹湖風雲錄

當時交大讀書風氣很盛，圖書館每天人滿為患，學生都得用一堆堆書來佔位置，根本沒有空位置，所以競爭很激烈、壓力大，第一年他的成績並不好，他心想是因為興趣不在此，所以過得痛不欲生，大二時甚至考慮重考。

有一天他走在校園裡，突來閃過一個念頭：「別人可以做的，我為什麼做不到？」他發現不要先設定自己不適合去做什麼，才不會自我設限，這一念之差，改變了楊學長所有的態度，第二年他的功課突飛猛進，一直到畢業時他都是名列前茅。

出國後是真正的轉折點

當完兵後，出國又是另一個機緣！當時，有一位交大的學長—竇祖烈院士，他們都叫他老竇，回到交大講學，而老竇學長在楊學長申請到的佛羅里達大學中任教，於是他就跟著老竇學長到美國深造。他說，當時老竇學長即已看出資訊工業與電腦是未來的主要發展。他也就從控制工程轉到電腦方面，開始學習一切有關電腦的知識。

楊學長認為電腦領域比過去所學的工程更人文一點，例如做設計、寫程式時，須要考量許多人文的判斷；要省時間抑或是省空間，是用軟體還是硬體省，對他而言就如同在編故事，有一些變數是主角、有些參數是配角，他覺得相當有趣。



楊德昌學長（左一）與哥哥楊日昌先生。

那時，老竇學長給了他一個沒有人做過、沒有參考資料的碩士論文題目—「中文電腦」。他花了一年的時間，想出一套如何使電腦使用與閱讀中文輸入法。這給楊學長一個很大的啟發：「去做沒有人做過的事情」，如同在創作的時候，也是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，要去找找到相關資源來完成它。由於楊學長研究順利，老竇學長早將他的博士路鋪好，他卻毅然決定前往洛杉磯去念電影，他說：「因為很多事想做都沒有即時去做，怕會來不及。」

當他拼命進入美國排名第一的南加大電影系後，卻發覺學校教的和他當初所想的完全不同，念了三個月後他就挫敗地離開了。楊學長說：「過去所學的科技講求證據，到了人文面，變成怎麼講都通，我感到很挫敗，所以就歸納認為自己沒有才華。」之後，楊學長在西雅圖某公司擔任系統設計工程師。

楊學長戲稱在擁有「正當職業」七年後，某天，他無聊地開車在街上閒晃，一個人去看了部由一位推動德國電影新浪潮的導演所執導的「天譴」電影後。他深深受到感動，而且被啟發了。他感性地說：「那時我才發現：原來電影可以讓人有這樣的感動。憑一個人的意念，在惡劣的環境中，能拍出他想要表達的，我心想也許我仍然有機會拍出自己的電影。」

竹湖風雲錄

回台灣開始投入電影世界

無獨有偶的，一位念電影系時認識的同學，找他回台灣寫劇本，他請假回來了解狀況後，陸續有工作找上門，於是他便辭掉西雅圖的高薪工作，回台灣投入了編劇的工作。後來他接了張艾嘉「十一個女人」的導演工作，正式投入電影圈，這些舉動還受到他母親的關切，勸誡他回到「正當職業」。

楊學長覺得自己相當幸運，因為他的作品在國際間很快地受到注意。最令他興奮的是1986年的作品「恐怖份子」，被視為具有突破性的影片，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的青睞，並得到那一年的英國電影學院獎。那一刻，他深深感觸到自己有科技的背景、訓練，使他編劇的劇情結構能精簡、效率高，也察覺到科技與人文間隔閡的不幸：「做技術、做工具的人不了解做創意、做內容者的需求，做創意者也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身真正的需要給技術者了解」。他慶幸自己在這兩邊都有機會去了解，可以讓他的作品品質比較好。

楊德昌學長過去的機遇與人生轉折甚多。如果他沒有多選填四個志願，也許就不會和交大有交集；如果當初他休學重考，科技面的背景將不完整，也許他的作品呈現不出科技與人文兼具的風格；如果他沒有看到那部德國電影，也許他不會再踏入電影這一行，而在科技界成為億萬富翁；如果他沒有糊裡糊塗的當了「十一個女人」的導演之一，他也許不會就這麼一頭栽進電影圈裡；如果....。太多的如果，使得一個人的人生有太多可能的變化，而楊德昌學長一點一滴的經驗，如今成就了他在國際影壇的地位。

人文與科技為何會分裂？

對於這個問題，楊德昌學長說「一一」所要探討的即人文和科技之分裂、隔閡有關，許多人都覺得人文是很籠統的、內在的、主觀的；科技則是客觀的、可以證明的。人文的學習過程中需要很多資訊，每一個體才能做正確的判斷、評估，他認為不僅劇中的吳念真會碰到，很多人都會碰到這個問題。他自己經過多年來的思考後，認為有許多因素造成了「人文與科技的分裂」：

1. 社會價值觀的影響

楊學長說當初考大學時，就強烈感受到社會價值觀把這兩者分得相當清楚，像男生成績好的就應該念理工科，成績爛的才去念文科、考乙組。在那個年代，大家都只想到科技帶來的社會地位、生活保障，所以父母、師長們希望子女去念理工科或醫科，而沒有真正考量到人文對我們的影響與價值是什麼。

2. 人文界長期被忽略，形成一種惰性

竹湖風雲錄

過去人文給一般人的印象並沒有那麼正面，尤其在思想封閉的年代，使得人文一直停留在次等位置，人文方面也形成一種自貶的惰性。

3. 中國文化本身的問題

楊學長表示中國儒教文化，並不鼓勵創作、創新。以前，在春秋戰國的時候，應該才是中華文化最輝煌的時候，因為每個國家都想一統天下，所以尊崇的學術思想都不同，所以思想力蓬勃發展。結果秦始皇利用法家一統天下，但是法家可以統一天下，卻不能治天下；到了漢朝，董仲舒主張獨尊孔孟，就是希望能長治久安。但是其前提為：假設儒家知道天下一切事理，對任何事都有定位，才能自圓其說。然而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比比皆是，新的君主說自己才是真命天子，使得儒學到後來沒有辦法自圓其說了，變成尚清談。這長久以來儒教思想的潛移默化，使得中國人創新的機會不多，例如在課堂上課時，是要學生找答案？還是聽答案就好？

楊德昌學長說人類的進化不屬於任何一個人種，而人一直在追尋一種真理，這是天經地義的。儒教文化的缺陷是假設已知道所有的東西，不承認可以尋找到真理，如此人文與科技當然會分開。他覺得科技與人文的分家在其他國家並未如此嚴重，因此他認為可能是與本身文化有關。

楊學長最後提到，有了網際網路之後，有很多知識可以透過新科技，馬上傳送到每個人手邊，不像過去想看一本書，要經過出版商、書店等長時間的拖延。現在，網路時代，知識推動著社會，非常快速、成本又低，那接下來是什麼？就是每個人都被逼著做動作，而「怎麼做」即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。

楊德昌學長小檔案：

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58級，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電機工程碩士。曾任職美國華盛頓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，後轉入演藝事業發展，擔任電視電影舞台劇等編劇與導演，並成立獨立製作影像及舞台劇公司。電影作品，包括：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、青梅竹馬、恐怖分子、一一等，多項作品曾屢獲海內外殊榮，今年更榮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之肯定。

